

性别身份的内涵及测量^{*}

颜士梅 吴轶珂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摘要:性别身份是个体对于自身性别文化含义的理解,是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典个性途径的研究传统下,性别身份模型从传统的单维度结构发展成将男性化和女性化分别作为两个独立维度的双维度结构,并产生了一种新的性别身份类型——“双性化”。随着性别身份研究的不断深入,性别身份的测量方法也从基于主观报告的经典量表测量,逐渐发展出了主客观结合导向、客观导向以及情境导向等新型测量思路。

关键词:性别身份;双性化;内涵;测量

中图分类号:B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0)05-0451-07

1 引言

性别身份是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反映了个体以男性和女性的文化定义为依据所形成的自我意识(Wood & Eagly, 2010)。传统的单维度性别身份观点主要依据生理性别差异对个体的性别身份进行划分,即认为男性就是男性化的,女性就是女性化的(Terman & Miles, 1936)。这种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阻碍了个体潜能的开发,尤其是限制了女性的职场上升空间(Eagly & Karau, 2002)。然而,双维度性别身份模型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性别身份的认定和束缚,承认个体可以兼具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质,即“双性化”的性别身份(Rossi, 1964; Bem, 1974)。并且,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双性化”不仅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而且能促进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和释放潜能(Feather, 1985; Martin, Cook, & Andrews, 2017)。

准确把握性别身份的内涵,恰当地使用性别身份测量工具和方法,是推进性别身份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关键。目前性别身份的测量工具和方法众多,各种测量方法都存在一定的优劣势(van Well, Kolk, & Oei, 2007; Sedney, 1981),但以往文献相对欠缺对性别身份测量方法的梳理和分析。鉴于此,本文将对性别身份的内涵和测量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旨在明确性别身份测量的不同思路及特征。

2 性别身份的内涵

英文中两个性别相关的单词 Sex 和 Gender 分别用于指代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通常是指个体与生俱来的基于两性基因和生殖器官的生物

差异;社会性别则关注在社会文化影响下个体后天形成的心理和社会特征。20 世纪 70 年代,性别角色(sex roles, 后渐称 gender roles)与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作为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概念,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Bem, 1974; Spence, Helmreich, & Stapp, 1975; Wood & Eagly, 2010)。性别角色是 societal 对男性和女性需要具备的特质以及两性间任务差异和活动范围的认定(Greenglass, 1982);而当个体将社会赋予男性和女性的文化内涵(即性别角色)内化后就形成了个体的性别自我意识,这种性别自我意识当即成为他们身份的一部分——性别身份。所以,性别身份反映了个体以男性和女性的文化定义为依据,所形成的对于自己的理解(Wood & Eagly, 2015)。更具体地说,个体通过性别身份理解自己作为男人或女人的文化含义,并通过自我调节过程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评估和指导(Wood & Eagly, 2012)。

性别身份研究主要存在两大研究传统,经典个性途径和性别自我分类途径(Wood & Eagly, 2015)。经典个性途径源于对个体个性和兴趣的差异研究,这一传统主要以 Bem (1974) 和 Spence 等 (1975) 的个性特征研究以及 Lippa (2001) 的性别典型兴趣研究为代表,并且引发了“双性化”(androgynous)性别身份的研究热潮。性别自我分类途径则是从社会身份视角强调人们对于两类社会群体(男性和女性)的归属感(Schmitt & Branscombe, 2001)。立足于个体差异问题,下文将聚焦经典个性途径研究传统下性别身份测量方法的梳理。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2162)。

通讯作者:吴轶珂, E-mail: wuyike@zju.edu.cn。

3 性别身份的测量

早期研究者将性别身份视为一个单维度结构,并将男性化(masculinity)和女性化(femininity)分别作为这个单维连续体的两个端点;根据个体的性别典型性差异,每个个体的性别身份都可以对应于这个单维连续体上某个特定的点(Terman & Miles, 1936)。基于单维度模型,早期性别身份的研究和测量都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的基础上:(1)男性化和女性化是一对单维对立的两极,两者相互消减,使得个体无法同时呈现高水平的男性化和女性化,即个体的性别身份不可能既是“男性化”的(masculine)又是“女性化”的(feminine);(2)性别身份与生理性别越一致,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即男性具有典型的男性化特质、女性具有典型的女性化特质是一种理想的性别身份模式(Ashmore, 1990)。Terman 和 Miles(1936)依照上述原则,选取对立的人格特征词汇分别用于描述男性化特质与女性化特质,编制了第一个性别身份量表,男性化-女性化量表(M-F量表)。

然而,随着性别身份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单维度的性别身份结构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1964年,Rossi提出了“双性化”概念,认为个体能够同时具有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并认为“双性化”是最理想的性别身份模式。Constantinople(1973)强调单维度的性别身份量表(M-F量表)从认知上人为约束了两性特质之间的关系,无法充分体现男性化和女性化之间的结构特点。并且,Constantinople第一次明确构建了性别身份的双维度结构模型,将男性化和女性化界定为两个独立的性别身份维度。自此,性别身份研究掀开了新篇章,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设计和开发符合双维度性别身份模型的测量方法。目前性别身份的经典测量方法都基于该双维度模型。

3.1 性别身份的经典测量

在众多双维度性别身份测量量表中较为经典的是贝姆性别角色量表(The Bem Sex-Role Inventory,简称BSRI)和个人特征问卷(Personal Attributes Questionnaire,简称PAQ)。

Bem(1974)以双性化概念为依据,以社会称许性为基础,开发了第一个双维度性别身份量表——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该量表由男性化分量表、女性化分量表和中性分量表三部分构成,每个分量表各包含20个条目。其中,男性化和女性化分量表分别选取了性别典型且受社会欢迎的特质;而中性分量表则选取了完全性别中立的受欢迎特质。中性分量表是为了避免被试在测量过程中出现反应偏

差而增设的填充选项,并不被用于性别身份的测量与分析。

同年,Spence, Helmreich 和 Stapp(1974)基于性别角色双维度结构和人格特质论编制了另一个性别身份量表——个人特征问卷(PAQ)。与BSRI相比,PAQ更关注个体稳定的行为倾向以及社会刻板印象对两性基本特征的描述(Spence et al., 1975)。他们认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简单的两性特质报告分析无法准确预测性别身份的状态。因此,他们用男性化表征工具性(instrumentality)特征,而用女性化表征表达性(expressiveness)特征,构建了一个同样包含三个独立分量表共54个条目的性别身份测量问卷。其中,男性化分量表共包含23个条目,女性化分量表包含18个条目,男性化-女性化分量表包含了其余13个条目。男性化-女性化分量表的条目混合了表达性和工具性特质。

伴随着性别身份双维度结构的提出,性别身份分类中出现了一个新类别——“双性化”。简单来说,双性化是一个被用于表示个体同时拥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的术语(Spence et al., 1975; Bem, 1977)。但是,由于研究者们在对双性化的理解和概念化方式上持有不同的观点,进而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性别身份分类方式和双性化的测度标准。其中,“平衡”概念模型(the “balance” conceptualization; Bem, 1974)和“双高”概念模型(the “high-high” conceptualization; Spence et al., 1975)是比较受欢迎的两种双性化概念化方式(Taylor & Hall, 1982; Powell & Butterfield, 2015),而t比率分类法和中位数分类法是分别对应于这两种概念模型的性别身份分类方式和测度方法。

3.1.1 平衡概念下的双性化测量

“平衡”概念模型认为“双性化”者是那些在自我描述中对男性化和女性化不加以区分的个体,因此,在这个概念模型中,双性化代表了个体自身对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同等认可(Bem, 1977)。基于这一定义,Bem(1974)采用t比率法将性别身份划分为三类(“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这种方法将个体男性化分数与女性化分数t值的差异定义为双性化分数。当双性化分数的绝对值显著大于0时,即被试的男性化分数与女性化分数的t值存在显著差异时,可以认为该被试是性别典型的。在性别典型者中,男性化分数小于女性化分数的记为“女性化”性别身份者;男性化分数大于女性化分数的记为“男性化”性别身份者。当双性化分数接近于0时,即当男性化和女性化分数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时,统称为“双性化”性别身份者。

3.1.2 双高概念下的双性化测量

由于“平衡”概念模型忽略了非性别典型群体中的个体差异,Spence等(1975)对性别身份进一步进行细分,提出了“双高”概念模型。顾名思义,“双高”即是指群体中男性化水平和女性化水平都相对高的个体;同理,群体中男性化水平和女性化水平双低者则被划分至一个新的性别身份分类——“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在测量方法上,Spence等(1975)采用了中位数分类法对性别身份进行分类。在获得了PAQ量表测量的原始数据后,他们通过分别对比单个被试的男性化分数和女性化分数与所有被试男性化分数中位数和女性化分数中位数的差异,将被试分为四类:“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及“未分化”。“男性化”者代表男性化分数高于男性化中位数而女性化分数低于女性化中位数的个体;“女性化”者反之。“双性化”和“未分化”者则分别表示被试的男性化分数和女性化分数都分别高于和低于两者的中位数。

3.1.3 平衡和双高概念下测量的优劣势比较

尽管基于双性化“双高”概念模型的中位数分类法和基于“平衡”概念模型的t比率分类法在当前的性别身份相关研究中应用比较普遍(Wood & Eagly, 2015),但是两种方法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Sedney, 1981)。

中位数分类法主要存在三大缺点(Sedney, 1981)。第一,使用样本中位数作为性别身份的划分依据,使得研究者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从而导致性别身份的判定指标随着样本的变化而变化。第二,对于不包含所有类型性别身份者的特殊群体,中位数分类法忽视了这类群体的实际情况,强制把个体分配到所有的性别身份类别中去。例如,在军队中几乎所有的个体都具有高男性化和低女性化的特征,因此在军队群体中大部分个体都具有“绝对”的“男性化”性别身份,其他性别身份的个体比例很低(Sedney, 1981)。然而,中位数分类法却依据个体在样本群体内的相对位置,强制分配给每个个体一个样本群体内的“相对”性别身份。第三,中位数分类法无法判定单个个体的性别身份。将中位数作为性别身份的判定指标不可避免地要对样本进行排序,结合这种方法判定标准缺乏统一性和普适性的缺点,中位数法必需要基于群体才能对个体的“相对”性别身份进行判定和分类。因此,研究者在使用中位数分类法判定个体的性别身份时必须满足严格的适用范围和前提,即只有当研究的样本足够大且具有代表性时,使用这种方法才比较可靠。

与中位数法相比,t比率分类法相对严谨客观,单个个体的性别身份根据其自身的测量结果就能确定,不需要依靠与他人或群体的比较,且分类结果也不易受样本或目标群体特征的影响。因此,所有使用t比率分类法的研究之间都可以相互对话。另外,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化和女性化分数同时低于量表刻度中点的个体只有1%左右,可以认为很难找到任何“绝对意义上”的“未分化”性别身份者(Bem, 1977)。因此,t比率分类法忽略非性别典型者(“双性化”者和“未分化”者)之间个体差异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那么重要。

但是,t比率法下的性别身份类别划分不够精细,还可能导致样本的损失。在使用t比率法进行精确的性别身份分类时往往会形成五个性别身份类别,除了“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三类外,在性别典型者和“双性化”者之间,还存在“近男性化”(near masculine)和“近女性化”(near feminine)这两个类别,一些研究为了保证精确性常常选择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剔除“近男性化”和“近女性化”这两个类别的样本(Bem & Lewis, 1975; Bem, Martyna, & Watson, 1976)。

3.2 性别身份测量的新探索

无论采用t比率法还是中位数法对性别身份进行分类时,都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缺点,学者们也一直在尝试用不同方法来弥补性别身份经典测量方法上的不足。

针对t比率法和中位数法的优劣势,Sedney(1981)提出研究者可以选择用量表刻度的中点或第一四分位数(第25百分位数)代替中位数分类法中的中位数作为判定标准。此外,Sedney还建议研究者将t比率分类法和中位数分类法相结合,形成性别身份测量方法上的优势互补。具体的操作是:首先使用t比率分类法判断出性别典型的个体(“男性化”和“女性化”),然后将所有剩余的非性别典型的个体通过中位数分类法区别出“双性化”和“未分化”的个体,最终形成性别身份的四种类别。

然而,无论采用t比率分类法、中位数分类法还是两者的结合,这些方法都将个体进行性别身份类别的划分,最终使性别身份成为一个分类变量,无可避免地丢失了原始数据中男性化分数和女性化分数中有价值的数值信息。因此,Bem(1977)建议研究者通过多元回归技术独立地检验男性化维度和女性化维度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实现保留原始数值信息的目的。

尽管这些基于传统量表测量的精巧构思和统计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性别身份经典测量的不

足,但是使用直接自我(或他人)报告式量表测量个体性别身份往往有较强的主观性(van Well et al.,2007)。为了更真实有效地测量个体的性别身份,主客观结合导向、客观导向以及情境导向的测量方法逐渐被引入性别身份的测量中。

3.2.1 主观与客观导向结合的测量

1987年,Eisler和Skidmore基于心理应激测试原理设计了一个包含40个问项的男性化性别角色压力量表(Masculine Gender Role Stress scales,简称MGRS),该量表通过情境描述制造被试未达到传统性别角色要求或性别身份受到挑战的情形(比如,好像没有我的朋友强壮),引起被试的压力或紧张感,最终依据被试自我报告的压力程度判断被试的性别身份。女性化性别角色压力量表(Feminine Gender Role Stress scales,简称FGRS)按照同样的原理进行设计,由39个问项组成(Gillespie & Eisler,1992)。虽然依据“测量过程中被试不需要进行自我评估的测量方式才是间接的”这一标准(de Houwer,2006),GRS仍然被判定为性别身份的直接测量方法,但是与BSRI和PAQ相比,通过间接询问被试的压力和紧张感程度,而非完全通过被试的主观报告判断性别身份,GRS强调了主观与客观的结合,在测量的客观性上有显著提升。

3.2.2 客观导向的测量

受到内隐联想测试、激活效应等的影响和启发,近年来客观导向的性别身份测量方法也开始受到关注和讨论(van Well et al.,2007)。

内隐联想测试(IAT)是一个计算机分类任务,通过反应时间差异评估被试对某个概念的无意识联想强度,反应越快说明自我和这一概念的联系越强(Greenwald,McGhee,& Schwartz,1998)。Greenwald和Farnham(2000)将IAT引入性别身份测量,让被试通过两个反应键将目标词语划分到四个分类(我、非我、男性化、女性化)中去,开发了性别内隐联想测试(GIAT)这一性别身份测量方法。GIAT需要进行两组测试,每组测试执行一组操作:第一组,“我”和“女性化”共享左反应键,“非我”和“男性化”共享右反应键;第二组,“我”和“男性化”共享左反应键,“非我”和“女性化”共享右反应键。根据被试这两组分类测试反应时的差异,被试的性别身份可以被有效判定。尽管以往有研究者认为GIAT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性别身份评估工具(van Well et al.,2007);但是,由于GIAT仅采用“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个笼统的分类,其所获结果的信息丰富性相对欠缺。

除了GIAT,同样基于IAT的性别身份测量方法

还有性别角色测试(GRT;Fernández,Quiroga,del Olmo,Aróztegui,& Martín,2011;Fernández,Quiroga,Escorial,& Privado,2014)。GRT先在电脑屏幕上呈现一项特定的活动或任务,然后让被试用左右键选择其认为能更好胜任这项任务者的性别(男性或女性),再依据被试对不同任务或活动的反应时间差异获知其内隐的性别身份。

性别启动任务(Gender Priming Task,简称GPT)则是在激活效应的启发下诞生的。激活效应主要表现为,相较于与自身情感不一致的目标单词,个体能更快地识别与自身情感一致的目标单词(Bargh,Chaiken,Govender,& Pratto,1992;Fazio,Sanbonmatsu,Powell,& Kardes,1986)。依据这一原理,GPT首先通过一个启动程序激活被试的自我相关(“我”)和自我无关(“他们”)的感知识别,接着向被试呈现具有男性化或女性化内涵的目标(人或物),并要求被试将目标放置到它们所属的分类标签“男性化的人”、“女性化的人”、“男性化的物”以及“女性化的物”中去(van Well et al.,2007)。因为被试响应自我相关目标的速度比响应自我无关目标的速度快,通过比较两者的反应时间差异就能确定其性别身份。尽管GPT避免了让被试进行自我报告,但是无法克服启动任务普遍存在的短板——信度较低(Bosson,Swann,& Penebaker,2000;Fazio & Olson,2003)。

3.2.3 情境导向的测量

临床心理学家和个性心理学家发现个体特征(attribute)是依据情境变化的,个体特征存在一定稳定性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即特质和状态两者并非是相互排他的(Best,2009)。因此,性别身份也具有一定灵活性的。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展现出不同的特质,比如在安慰他人时表现女性化特质,而在完成抽象任务时表现出男性化特质(Bem & Lewis,1975;Bem et al.,1976)。由此可见,情境是性别身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基于情境视角对个体的性别身份进行考察(Mehta & Dementieva,2017;Mehta,2015;Pickard & Strough,2003)。

Pickard和Strough(2003)通过一个实验研究考察了被试分别与男性和女性伙伴合作完成叠积木游戏时性别身份的瞬时状态。在这个研究中,Pickard和Strough通过让被试报告自己在进行叠积木游戏时BSRI量表中形容词描述的即时准确性,获得被试瞬时性别身份的信息。他们在保留全部形容词问项的情况下将BSRI改编为适用于瞬时情境测量的情境性别角色量表(The State Gender Role Inventory,

简称 SGRI)。实验结果显示,无论男性被试还是女性被试,当他们与异性伙伴合作时所报告的瞬时女性化状态比他们与同性伙伴合作时的高。因此,该实验不仅证明了社会交互等情境因素确实会影响个体的瞬时性别身份,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测量情境性别身份的工具。

为了更精确地测量情境性别身份, Mehta (2015) 建议研究者采用经验取样法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简称 ESM) 收集性别身份在不同情境下的状态数据。ESM 是生态瞬时评估法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简称 EMA) 的一种数据收集方式 (封丹珺和石林, 2004), 研究者通过信号设备提示被试在特定时点即时报告自己当前的状态和行为, 从而在短时间内多次收集个体在不同工作生活场景下的瞬间数据, 进而获得随时间或情境变化而变化的信息 (Bolger & Laurenceau, 2013; 张银普, 骆南峰, 石伟, 2016)。ESM 的应用使得性别身份的情境研究从特定单一时点的实验室研究逐渐扩展到了可以考察现实工作生活情境的实地研究 (Mehta & Dementieva, 2017)。

4 性别身份测量的总结与应用展望

4.1 性别身份测量总结

综上所述,在性别身份的经典个性途径研究传统下,基于双维度模型,性别身份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1)基于传统量表(BSRI和PAQ)的经典测量;(2)主客观结合导向(GRS)、客观导向(GIAT、GRT、GPT)及情境导向(SGRI)的新型测量。性别身份的经典测量主要通过自我或他人的主观报告,直接获得个体性别身份的相关信息。虽然经典测量在以往研究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这种测量方法在客观性和准确性方面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针对经典测量的不足,后续研究者提出了t比率法与中位数法相结合的性别身份测量方式,还发展了主客观导向结合思路下的测量、客观导向的测量以及情境导向的测量等性别身份的新型测量方法。这些探索性测量的开发,为以后较为完善地使用性别身份测量进行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4.2 性别身份测量的改进思路

未来性别身份测量的应用可以沿着以下两种思路在相关研究领域展开。(一)结合思路。任何一种性别身份的测量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陷,研究者可以通过两种或多种方法结合的方式,形成方法间的相互取长补短,从而获得准确、有效的性别身份测量结果。例如,个体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或面对不同身份的对象)时,可能会拥有不同的瞬时性别身份,因此,在进行测量时常常需要针对特定情境进行

反复测量。若研究者仅采用主观性量表(SGRI)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测量,较难避免被试会受到早前记忆的影响,从而导致情境因素对瞬时性别身份的影响无法被真实反映;而若研究者仅采用客观导向的测量(GIAT),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主观量表的缺陷,但由于GIAT只通过“男性化”和“女性化”两个分类标签对领导者的性别身份进行笼统的分类,而无法获得足够的具体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将SGRI与GIAT这两种性别身份测量方法相结合,形成优势互补尤为必要。(二)验证思路。自我报告式的方法(量表测量)常会被质疑其测量的客观性和有效性(van Well et al., 2007),但是不可否认,这种通过多个问项对同一维度进行评估的方法,往往能让研究者获得比其他客观的间接测量方法(如GIAT、GPT等)更多更有价值的数值信息。因此,研究者可以考虑在一个研究中先采用自我报告式的量表来测量,然后再运用客观导向的间接测量来进行验证。这种思路能够帮助研究者在获得准确的性别身份分类数据的同时,还保留了可供进一步深入挖掘的量表问项内容和测量结果数值等有价值的信息。

4.3 性别身份测量的应用展望

性别身份测量除了在传统的社会性别相关研究中得以应用,还可以被运用于以下几个领域:首先,可以运用于领导力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由于领导者的性别身份已经被许多研究证明对领导力的发挥具有多方面的影响(Kark, Waismel-Manor, & Shamir, 2012; Kent & Moss, 1994; Koenig, Eagly, Mitchell, & Ristikari, 2011),因此,未来研究者不仅可以从领导者的角度,进一步对领导者性别身份特征与领导行为(风格)、领导意愿等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化考察;也可以从下属、团队或组织的角度,对性别身份与领导涌现、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性别者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探究。而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在选拔领导者时也可以考虑增加对候选人性别身份的测评,从而挑选出符合组织切实需求的领导者。其次,性别身份测量对于心理健康的研究以及心理疾病的预防和诊断都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性别身份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从对个体自信、幸福感等的关注(Whitley, 1984; Lau, 1989),转向具有临床实践意义的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的关注(Guz, Kattari, Atteberry-Ash, Klemmer, Call, & Kattari, 2020; Kalsoom, 2019),从而对性别身份测量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性别身份测量还被应用于对少年儿童的成长观测和性别教育。性别教育缺失和刻板印象导向的性别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

束缚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盖笑松,王晓宁,张婵,2009),通过适时观测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性别身份的变化情况,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进行引导。

参考文献

- 封丹珺,石林.(2004).应对方式的生态瞬时评估法及其他测量方法简介.《心理科学进展》,12(3),429-434.
- 盖笑松,王晓宁,张婵.(2009).走向双性化的性别角色教育.《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27-231.
- 张银普,骆南峰,石伟.(2016).经验取样法——一种收集“真实”数据的新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4(2),305-316.
- Ashmore, R. D. (1990). Sex, gender, and the individual. In L. A. Pervin (Ed.),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486-52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argh, J. A., Chaiken, S., Govender, R., & Pratto, F. (1992). The generality of the automatic attitude activation e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6), 893-912.
- Bem, S. L. (1974). 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2), 155-162.
- Bem, S. L. (1977). On the utility of alternative procedures for assessing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5(2), 196-205.
- Bem, S. L., & Lewis, S. A. (1975). Sex role adaptability: One consequence of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1(4), 634-643.
- Bem, S. L., Martyna, W., & Watson, C. (1976). Sex typing and androgyny: Further explorations of the expressive dom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5), 1016-1023.
- Best, D. (2009). Another view of the gender-status relation. *Sex Roles*, 61(5-6), 341-351.
- Bolger, N., & Laurenceau, J. P. (2013). *Intensive longitudinal methods: An introduction to diary and experience sampling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Bosson, J. K., Swann, W. B. Jr., & Pennebaker, J. W. (2000). Stalking the perfect measure of implicit self-esteem: 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4), 631-643.
- Constantinople, A. (1973). Masculinity-femininity: An exception to a famous dictu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5), 389-407.
- deHouwer, J. (2006). What are implicit measures and why are we using them? In R. W. Wiers & A. W. Stacy (Eds.), *The handbook of implicit cognition and addiction* (pp. 10-2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agly, A. H., & Karau, S. J. (2002). Role congruity theory of prejudice toward female leader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9(3), 573-598.
- Eisler, R. M., & Skidmore, J. R. (1987). Masculine gender role stress: Scale development and component factors in the appraisal of stressful situations. *Behavior Modification*, 11(2), 123-136.
- Fazio, R. H., Sanbonmatsu, D. M., Powell, M. C., & Kardes, F. R. (1986). On the automatic activa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2), 229-238.
- Fazio, R. H., & Olson, M. A. (2003). Implicit measures in social cognition research: Their meaning and us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297-327.
- Feather, N. T. (1985). Masculinity, femininity, self-esteem, and subclinical depression. *Sex Roles*, 12(5-6), 491-500.
- Fernández, J., Quiroga, M. A., del Olmo, I., Aróztegui, J., & Martín, A. (2011).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gender roles: Gender roles test (GRT-36). *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4(2), 899-911.
- Fernández, J., Quiroga, M. A., Escorial, S., & Privado, J. (2014). Explicit and implicit assessment of gender roles. *Psicothema*, 26(2), 244-251.
- Gillespie, B. L., & Eisler, R. M. (1992).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ne gender role stress scale: A cognitive-behavioral measure of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for women. *Behavior Modification*, 16(3), 426-438.
- Greenglass, E. R. (1982). *A world of difference: Gender roles in perspective*. Toronto: John Wiley and Sons.
- Greenwald, A. G., & Farnham, S. D. (2000).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measure self-esteem and self-concep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6), 1022-1038.
-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 Schwartz, J. L. (1998).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6), 1464-1480.
- Guz, S., Kattari, S. K., Atteberry-Ash, B., Klemmer, C. L., Call, J., & Kattari, L. (2020). Depression and suicide risk at the cross-section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for you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in press.
- Kalsoom, U. (2019). Gender role in anxiety,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atients. *Pakista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36(2), 251-254.
- Kark, R., Waismel-Manor, R., & Shamir, B. (2012). Does valuing androgyny and femininity lead to a female advant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rol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identification.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3(3), 620-640.
- Kent, R. L., & Moss, S. E. (1994). Effects of sex and gender role on leader emerg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7(5), 1335-1446.
- Koenig, A. M., Eagly, A. H., Mitchell, A. A., & Ristikari, T. (2011). Are leader stereotypes masculine? A meta-analysis of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 616 – 642.
- Lau, S. (1989). Sex role orientation and domains of self – esteem. *Sex Roles*, 21(5 – 6), 415 – 422.
- Lippa, R. A. (2001). On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 feminin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5(2), 168 – 207.
- Martin, C. L., Cook, R. E., & Andrews, N. C. Z. (2017). Revisiting androgyny: A modern day perspective on flexibility of gender identity and behavior. *Sex Roles*, 76(9 – 10), 592 – 603.
- Mehta, C. M. (2015). Gender in context: Considering variability in wood and eagly's traditions of gender identity. *Sex Roles*, 73(11 – 12), 490 – 496.
- Mehta, C. M., & Dementieva, Y. (2017). The contextual specificity of gender: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 in college students' same – and other – gender peer contexts. *Sex Roles*, 76(9 – 10), 406 – 416.
- Pickard, J., & Strough, J. N. (2003). The effects of same – sex and other – sex contexts on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Sex Roles*, 48(9 – 10), 421 – 432.
- Powell, G. N., & Butterfield, D. A. (2015). The role of androgyny in leader prototypes over four decades. *Gender 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0(1), 69 – 86.
- Rossi, A. S. (1964). Equality between the sexes: An immodest proposal. In J. L. Robert (Ed.), *The woman in America* (pp. 98 – 143). Boston, MA: Boston Press.
- Schmitt, M. T., & Branscombe, N. R. (2001).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manly: Threats to one's prototypicality and evaluations of fellow in – group memb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7(6), 510 – 517.
- Sedney, M. A. (1981). Comments on median split procedures for scoring androgyny measures. *Sex Roles*, 7(2), 217 – 222.
- Spence, J. T., Helmreich, R. L., & Stapp, J. (1974). The personal attributes questionnaire: A measure of sex role stereotypes and masculinity – femininity. *Journal Supplement Abstract Service Catalog of Selected Documents in Psychology*, 4, 43 – 44.
- Spence, J. T., Helmreich, R. L., & Stapp, J. (1975). Ratings of self and peers on sex role attribut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self – esteem and conceptions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1), 29 – 39.
- Taylor, M. C., & Hall, J. A. (1982).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Theories, methods, and conclus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2(2), 347 – 366.
- Terman, L. M., & Miles, C. C. (1936). *Sex and personality: Studies in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New York: McGraw – Hill.
- van Well, S., Kolk, A. M., & Oei, N. Y. L. (2007). Direct and indirect assessment of gender role identification. *Sex Roles*, 56(9 – 10), 617 – 628.
- Whitley, B. E. (1984). Sex – role orien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 – being: Two meta – analyses. *Sex Roles*, 12(1 – 2), 207 – 225.
- Wood, W., & Eagly, A. H. (2010). Gender. In S. T. Fiske, D. T.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5th ed., pp. 629 – 667). Hoboken: Wiley.
- Wood, W., & Eagly, A. H. (2012). Bio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x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behavior.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55 – 123.
- Wood, W., & Eagly, A. H. (2015). Two traditions of research on gender identity. *Sex Roles*, 73(11 – 12), 461 – 473.

Gender Identity: It's Connotation and Measurement

Yan Shimei Wu Yike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Gender identity is an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one's gender,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dividual's self – concept. Under the classic personality approach, the gender identity model has evolved from a traditional single – dimensional structure to a two – dimensional structure with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as two independent dimensions, and a new type of gender identity called “androgyny” has emerged. With in – depth studies of gender identity, the measuring methods of gender identity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classical scale measuring method based on subjective reports to some new measuring approaches such a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mbined orientated measurement, the objectivity – oriented measurement, and the situation – orientated measurement.

Key words: gender identity; androgyny; connotation; measurement